

在中国传统习俗中，改头剃发是极其重要的事情，象征着权力、文明和命运的改变。溥仪剪掉辫子对清室宗族的遗老们造成了巨大的震动，同时，也使宫外的社会各界重新认真看待这位少年逊帝。这算得上溥仪在故宫生活阶段中最有力最革命的举动。

由此可见，庄士敦是溥仪熏染西方文明和现代观念的媒介和引路人。他出现在紫禁城的意义就是从内务府、太妃、宫监与遗老们的包围中解放溥仪，从腐朽的、“不健康”的氛围中挽救溥仪，使这个少年免于精神上的畸形，溥仪本人就很清楚：“他更注意的是教育我像个他所说的英国绅士那样的人”。而西方最新的物质文明成果——轮船、有轨电车、留声机、照相机、铅笔、钢笔、手表、自行车、外国画报、西餐、西乐乃至西装革履、金丝眼镜在溥仪的用品和陈设的出现不过是这种教育的物质工具。另外，溥仪所追逐的西方文明生活方式，不过是原先因为他的幼小和逊清皇室的腐朽封闭，在宫内没有条件接触和追求罢了。在紫禁城墙外，对西洋货的喜爱，对现代新产品的时髦追求已是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的风潮。庄士敦只是为溥仪打开了这扇窗户，让新鲜的风尚吹进来，使溥仪能够和当时中国许多年轻的富家子弟一样，能够有醉心欧化、追求时髦生活的选择。溥仪回忆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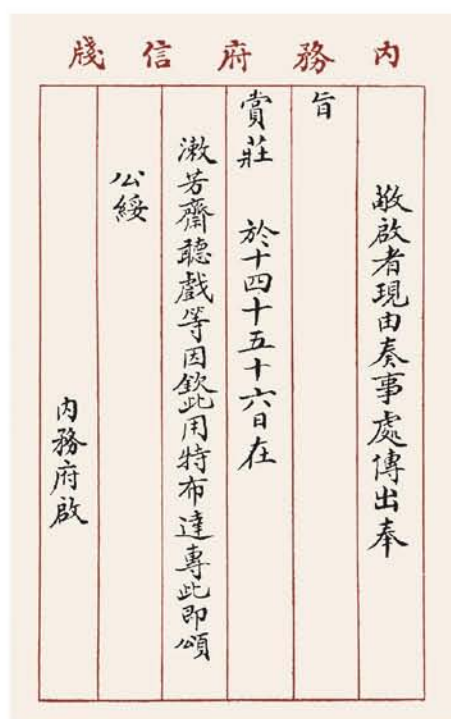
我十五岁那年，决心完全照他的样来打扮自己，叫太监到街上给我买了一大堆西装来。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、大得出奇的西服，而且把领带像绳子似地系在领子的外面。当我这样的走进了毓庆宫，叫他看见了的时候，他简直气得发了抖，叫我赶快回去换下来。第二天，他带来了裁缝给我量尺寸，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。

在次年的大婚典礼上，溥仪的穿着再次气坏了庄士敦：

在我结婚那天，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面。祝了酒，回到养心殿后，脱下我的龙袍，换上了便装长袍，内穿西服裤，头戴鸭舌帽……庄士敦看见了我，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，立刻脸上涨得通红，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一跳，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，又使我感到莫名其妙。外国人走了之后，庄士敦



任命庄士敦为颐和园总管的上谕



邀请庄士敦进宫听戏的请柬

的气还没有消，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：“这叫什么样子呵？皇帝陛下！中国皇帝戴了一顶猎帽！我的上帝！”

